

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

张明华著

黃虞稷和千頃堂書目

張明華 著

◎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

张明华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2 元

ISBN 7-80049-449-7/G · 483

前　　言

黄虞稷（1629—1691），并不著名。由于他知名度不高，今天的读者知道的就不多了。

他生活在清代康熙年间，既不是清廷功名显赫的大官僚，又不是社会名流，而是位连进士都不是的老秀才，知道他的人就不多了。可就是这位困诸生三十余年的黄虞稷，却默默无闻地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他个人之力，编纂了一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组织人力才能完成的古籍编目工程《明史艺文志稿》，收录南宋、辽、金、元、明人著作，填补了宋末至明末三百多年艺文之空白。清著名学者朱彝尊说他这项古籍编目工程“摭采特详”，“功崇稽古者也”。黄虞稷又和书友周在浚发起一个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征刻唐宋秘书运动，使当时不少濒将绝灭的珍罕典籍，得以保存下来。今天我们藉以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科技诸方面的重要典籍，其中不少是由他发起征刻而保存下来的。黄虞稷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遗憾的是，黄虞稷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几十年来，很少有人研究；他花一生心力所凝成的《明史艺文志稿》，被清代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大加删削，变成王鸿绪的《明史稿艺文志》和清王朝钦定的《明史艺文志》，内容削减大半，已非原貌，且原稿已失传。更有甚者，黄虞稷的名字在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艺文志》及钦定的张廷玉纂修的《明史艺文志》中被抹去了，他纂修《明史艺文志稿》的成果被人剽窃了，而窃取他成果的王鸿绪、张廷玉却享大名，这似乎是太不公道了。

幸喜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的前身《千顷堂书目》早在外间流传，又赖比他稍后的学者杭世骏、卢文弨、吴骞的校勘和增补，以及张钧衡《适园丛书》本的刊刻，我们才能窥其概貌。由于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早已失传，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其初稿《千顷堂书目》。但其初稿《千顷堂书目》，仍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近十年来，笔者接触到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的有关材料，为目录学家黄虞稷公其所藏的坦荡胸怀以及编目中的不屈不挠精神所感动；也为黄虞稷的编纂成果在身后被王鸿绪利用职权剽窃而忿忿不平。为表彰这位默默无闻的目录学家对祖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为这位藏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争有一席之地，故不自量力，进行这项《千顷堂书目》研究。由于黄虞稷留下的材料不多，其《明史艺文志稿》又失传，而现存的《千顷堂书目》已渗透了杭世骏、卢文弨、吴骞、张钧衡等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盘根错节处，加之我根底太差，并气浮心粗，难免疏漏，尚祈读者指正。

张 明 华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八七年九月修订于上海

一九八八年十月再次修订于上海

序

明华同志写成了黄虞稷的评传，使我很惊奇。黄虞稷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而迄今还没有一本专传，无疑应当为之撰写。明华对于黄虞稷研究有素，对于黄氏的目录学及文献学的巨著《千顷堂书目》用力尤深，由她来写，的确是门对户当。这些都不会使我嗟讶。只是觉得明华不灵当市面，就要传写历史人物吧，也不该拣了这么个甘于寂寞、兀兀穷年、终老山林、后世名声亦不很大的老文献学者来写。历史上也多着叱咤一世和高风亮节的人物，人们正争着写，也不怕碰车。这不明摆着“背时逆势”吗？但这个“结”是能够解开的。明华本身就是位宁静淡泊、孜孜不倦的学者。人们都知道演剧必须进入角色才能演好，写传记也遮莫有相似之处。对传主的心态、情操、风格和行为有了最大幅度的同情和共振，就占领了写好这本评传的一半的阵地。

黄虞稷之所以使人永远尊敬，是因为他以一介儒生，不在其位，而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著录有明一代文献的巨大工作：编撰成了后来作为《明史·艺文志》底稿的《千顷堂书目》。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的：“斯目所录，皆明一代之书。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是前朝图书文献大量损失丧亡的最严峻的关口。也往往就是在这种当口，有志之士以民族文献为己任，勇于在众所不为之时，奋起收拾，勤恳终身，为中流之砥柱，保护住了一代的文献。董康题《中州集》句云：“中州文献问遗山（元好

问)。”我们亦要说:“朱明文献问俞邰(黄虞稷)。”我们中华民族的图书与文献,代代相继,世世遗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断层,在最可能出现断层的危急关头亦被扭转了过来,这是什么缘故?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就得要好好地感谢和敬重像黄虞稷这辈的文献学家的功劳。

黄虞稷保护文献之功,主要是对有明一朝,但范围这要广一些。《千顷堂书目》在每一类目里,于著录明代著述之后,都要附记宋、金、元人的著作目录。《四库提要》对此不能理解,说什么“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其实黄虞稷是有意识这样著录的,亦为拾遗补缺、保护文献而作。因为金、元二史,皆无《艺文志》,而《宋史·艺文志》乃以前朝《国史·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为依据,至理宗宝庆以后新出之书,概未收录,所以黄虞稷为之弥补,乃属有的放矢,而非“既不赅备”。正是由于黄虞稷作了这样的功,所以来仇灿、卢文弨、钱大昕、金门诏等乃有补宋、金、元史《艺文志》之作。

黄虞稷还投身于征刻唐、宋遗书的运动,同他的白下(南京)书友周在浚共拟《征刻唐宋秘书目》,纪映鍊等为之作《启》,张芳为之论证。虞稷之世,汉、魏古籍,存亡已定(当然他们未料到后来汉墓仍出现汲冢的奇跡);唐、宋稀见之书则在若存若亡之间,不亟有此拯挽之举,则久而沦亡必多。正是由于他们发起了这个壮举,拟订了这个书目,后两百年间,长塘鲍氏(廷博)、琴川张氏(海鹏)、金山钱氏(熙祚)等竟刻丛书,多收唐、宋秘籍,《征刻书目》之所列举,几能遍传于世,有清季叶德辉作《征刻唐宋秘书目考证》逐项为之标明,证实了此举之开花结果。

黄虞稷之喜爱读书、藏书,以维护文献为己任是继承他父亲黄居中的心愿及事业。黄家本为福建晋江人,但居中、虞稷的活

动都不在家乡，而是在江南。居中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后，先在上海县学担任过教谕，和上海也带上了关系。后来去南都任国子监监丞，锐意藏书，老而弥笃，所收凡六万多卷。虞稷生于崇祯二年（1629），出生地点应是在南京，老父已年六十八。居中在崇祯十七年（1644）以八十三岁高龄去世，虞稷时年十六岁，已能读父书，守其所藏，并不断增益，这就是千顷堂藏书的来历。黄氏千顷堂地在南京，黄虞稷的活动亦在南京。他家的藏书并不曾迁运回家乡去。故《四库总目提要》曰：“虞稷先世泉州人，崇祯末流寓上元。书首自题曰‘闽人’，不忘本也。”那么，南都覆亡之时，千顷堂藏书怎么保存下来的呢？由于南都是迎降的，遭受的损害不大，不像大江南北许多名城因坚决抵抗而惨遭屠焚，加以迎降的大臣钱谦益本为黄居中的忘年交，曾阅书于千顷斋，且为之作《藏书记》，千顷堂（斋）藏书之得保全者以此。这一大书藏，就成了黄虞稷著录有明一代文献的根据。黄家为晋江人，其赫赫书藏并不在晋江，故晋江无有遗迹可考。晋江正在新修地方志，对先贤遗迹及文物收集颇富，但于黄氏父子和千顷堂却未有特殊的材料提供。

这么个大学问家，大有功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文献学家，欠缺了他的一部评传可是我们文化学术上的遗憾。写黄虞稷的评传，却不容易。因为有关他的事迹，反有“文献不足”之苦。他对文献的主要贡献即《千顷堂书目》，斯目卷帙既富，刊刻之前抄校诸本多有歧异，刊刻之后又有增补重订之册，从康熙以至近代，许多目录、文献学大家如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騤、张钧衡、王国维、瞿凤起、潘景郑等都曾为之耗了大量的精力，求其完善。而这部书目是作为有明一代文献综录而编撰的，于是成了当时民修和官修明史的艺文部分享其现成、剽窃割裂的饩羊，情况复杂，理绪繁难。明华同志可是有勇气，有毅力，逐一比对了各种版本，弄

清了问题，又能不趋时附炎，潜心笃志写成这本评传，可说是对得起祖国文明的作品。

明华同志是故友目录、文献学宗师王有三（重民）教授的高足，又承有三先生夫人刘修业教授之教，学有根底，颖敏勤奋，故能卓有成就。有三先生生前亦曾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之关系反复考查，明华同志能在老师研究的基础上，更出新见，修业夫人亦喜而以过去未见的重要资料相授。有三先生不幸不能见到高弟子的新成就，然其在天英灵必定感到无比的欣慰。

我国的中年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研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比老年知识分子还困难得多。女同志再要加上几重困难。但是明华同志的责任感很强，有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责任感，这也正是她能写、能写好黄虞稷评传的因素。不过，她的爱人钱毅工程师很好，在家务上分担了不少的忙。人们常说丈夫的社会贡献妻子有一半的功劳，明华家的情况多少有点相反。钱毅说，我要让明华发挥长处，多做出点特殊的贡献来。我看在眼里，为他们高兴，但也有沉重的感慨。从这种情况和承压力，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前途，看到了我们文化的前途，但是我们的社会应当承认有责任感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的价值，不能让他们长期在艰困的环境中奋战。我相信情况一定会得到改变。

胡 道 静

1989年3月30日写于劫后海隅文库

目 录

一	黄虞稷生活的时代	(1)
	(一) 动荡的社会	(1)
	(二) 顺治康熙时代	(7)
	(1) 清代封建专制皇权的加强	(7)
	(2) 清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0)
	(3) 平定三藩，统一台湾	(12)
	(4) 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恩威并举政策	(14)
二	三百多年艺文之空白，由黄虞稷填补	(18)
	(一) 纂修明代艺文的几个不利因素	(19)
	(二) 焦竑、傅维麟、尤侗尝试的失败	(28)
	(三) 黄虞稷的成功	(30)
三	家世与千顷斋藏书	(32)
	(一) 黄虞稷家世	(32)
	(1) 父亲黄居中	(33)
	(2) 哥哥黄虞龙	(36)
	(3) 母亲周氏	(39)
	(二) 黄虞稷与千顷斋藏书	(42)
四	黄虞稷的交游	(54)
	(一) 奥丁雄飞的《古欢社约》	(55)
	(二) 在龚翔麟家坐馆	(59)
	(三) 同龄人宋彝尊	(61)
	(四) 倪灿写序	(64)

	(五) 徐元文、徐乾学兄弟	(70)
	(六) 与张芳等人的书信往来	(73)
五	《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	(82)
	(一) 编《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稿》	(82)
	(二) 《明史艺文志稿》的三个钞本	(87)
	(三) 《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的异同	(88)
六	《千顷堂书目》的内容	(93)
	(一) 《千顷堂书目》在著录内容上的创新	(93)
	(二) 《千顷堂书目》的分类和编排序次	(94)
	(三) 《千顷堂书目》是研究明史的一把钥匙	(96)
	(1) 经学方面	(96)
	(2) 史学方面	(99)
	(3) 文集方面	(105)
	(4) 科学文化方面	(110)
七	《千顷堂书目》与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张廷玉《明史艺文志》的关系	(114)
	(一) 《张志》和《王稿》	(114)
	(二) 《王稿》和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	(118)
	(三) 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落入王鸿绪之手的原因	(129)
	(四) 《张志》经部五类书目与《千目》同类书目的比较	(131)
八	《千顷堂书目》的版本源流	(148)
	(一) 从朱彝尊藏《千顷堂书目》本到杭世骏道古堂增补本	(148)
	(二) 从朱文游藏黄氏《明史艺文志稿》本到卢文弨校本	(161)
	(三) 从杭世骏道古堂藏本到吴骞校本	(178)

(四) 张钧衡《适园丛书》本	(189)
(五) 从张钧衡《适园丛书》本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本	(196)
(六) 王国维《千顷堂书目》校本	(204)
九 《千顷堂书目》的分化	(211)
(一) 杭世骏、全祖望为增补四朝艺文所作的努力	(211)
(二) 《千顷堂书目》的第一次分化	(216)
(1) 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	(216)
(2) 吴骞的《四朝经籍志》	(219)
(3) 张锦云的《元史艺文志补》	(220)
(三) 《千顷堂书目》的第二次分化	(221)
(四) 《千顷堂书目》和清代及以后的补史艺文志之风	(224)
十 《千顷堂书目》的不足	(228)
十一 黄虞稷和征刻唐宋秘本书运动	(231)
(一) 黄虞稷与周在浚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232)
(二) 倪灿、周铭的《征刻唐宋秘本书例》	(236)
(三) 五名士的《征刻唐宋秘本书启》	(242)
(四) 张芳的《征刻唐宋秘本书论略》	(244)
(五) 曹溶的《流通古书约》	(247)
(六) 倡议征刻唐宋秘本书的时间	(251)
(七) 百种唐宋秘籍刊布概况	(253)
附录	
黄虞稷简表	(261)

一 黄虞稷生活的时代

(一) 动荡的社会

明王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建立的封建帝国。这个王朝自中叶以后，出现了童昏无知的武宗，昏愦凶狠的世宗，不问国事的穆宗，贪得无厌的神宗，糊涂弩弱的光宗，一字不识不知国事的熹宗。特别是万历以后，由于宦官专政，政治腐败，日趋下坡路。到明思宗(崇祯)朱由检接位，已是矛盾重重，明王朝的全面崩毁已指日可待了。

明代社会有三大危害，一是住在关外的建州统治者闯进山海关，在北京周围五百里地面，实行圈地制度，并步步窥视明王朝，造成对明代北方的重大威胁。二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的骚扰。日本海盗、商人勾结内地土豪、奸商、流氓、无赖，深入内地进行抢劫，他们攻陷州县，烧杀淫掠，成了东南沿海人民的极大祸害。三是由于明代皇帝的童昏、漫不省事而引起的阉宦的专政，特务统治。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爪牙布满全国，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忠梗之士杨涟、左光斗等被庭杖而死，一片白色恐怖。这三大危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统治。

权奸当道，政治黑暗，天灾人祸频仍，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队，迅速摧毁明王朝的统治。

在黄虞稷刚满十六岁的那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

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由于明朝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满清统治者，引狼入室，清军入关。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城，刚建立的大顺政权迅速瓦解。清兵南下，江南人民进行了抵抗，其反抗之激烈，为世所罕见。

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十三日，北京城破的消息传到南京，金陵城震惊了。南京本为陪都，设有宗人府以下六部衙门。在南京，由南京的官僚及一些有志之士，建立起以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首的福王政权。在福建，有唐王朱聿键（隆武帝）为首的福建政权。在浙东，有鲁王朱以海的政权。整个中国，战火四起，处于风雨激荡之中。

建立在南京的福王政权，如能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抵抗建州卫的南侵，即使不能恢复中原，维持一个东晋或南宋局面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政权腐败透顶，不堪担任这个重任。这个福王由崧就是明代后期三大案中梃击、移宫、红丸中的关键人物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常洵的儿子。立由崧当皇帝，势必推翻崇祯朝《三朝要典》中对这三大案的定论，因凡是参与三案的人物、涉及三案的嫌疑人物都编入《三朝要典》中。国家已经到了大崩毁的边缘，再来一个大翻案，整个朝政岂不乱哄哄，加速它的灭亡。再说这个福王又不是明贤之主，是个极端腐化昏聩的傀儡，他大兴土木，沉湎酒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由他主持的小朝廷是无法担负抗清斗争重任的。

在这个政权中扶持福王的有马士英、史可法、阮大铖、吕大器、张顺言、姜曰广、高弘图、王铎等等，不乏名臣。但由于马士英排挤史可法，大臣内部纷争、喧嚣没完没了，一切的努力都在相互牵掣、相互抵触上消失了。原由张顺言、高弘图、史可法联立的内阁转变为马士英执政的内阁，马士英入阁后汲引阮大铖为兵部侍郎。大铖有才，但是逆案中人物，声誉差。这造成大臣

们和马士英、阮大铖的对立。一次，姜曰广与马士英在弘光帝前公开吵架，弄得弘光也无可奈何。一切都在乱哄哄中。

当时的南京城里出了二件事，一是妇人童氏，自称是弘光帝继配，请求入宫；二是北京来的王之明，自称是崇祯的太子。这二件事，百姓要管，大小文武官员要管，为此，人们分成二派，一齐哄起来，又乱哄哄起来了。

当时的财政危机严重，财力竭蹶，甚至连和尚和妓女都要每人捐出白银二两，实在是太危险了。南京政权在急速腐化、内鬨，无法拧成一股抵抗力量。

当时驻守在南京外围的有几位大将，史可法以督师地位坐镇扬州，高杰驻守泗州（安徽泗县），刘泽清驻守淮安，刘良佐驻守临淮，黄得功驻守庐州，在清军南下打到淮、徐，江北快保不住的时候，守备在江北的四镇还在抢占地盘，相互火并，高杰被投降清朝的许定国设计杀死，刘良佐、刘泽清逃之夭夭，身为督师的史可法无师可督，退守扬州。五月十三日，清军兵临城下，包围扬州城。腐朽的弘光政权忙于应付左良玉，不派兵增援。扬州城孤立无援，虽经史可法及军民的英勇奋战，但孤不敌众，城破，史可法被俘。清军劝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慷慨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于是被杀害。其部将刘肇基等率残部和城内人民一起，继续与清军鏖战，直到人亡矢尽。清军入扬州后，实行血腥屠杀，其残酷程度，可于《扬州十日记》见之。

扬州失守，史可法以身殉职，高杰死了，刘泽清、刘良佐投降清庭，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降清。清兵血洗扬州后，乘势渡长江，迅速占领南京的门户镇江。这时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清兵追至，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这时的南京小朝廷，鸡飞蛋打，乱作一团，有的纷纷逃窜，如鸟兽散，有的“奉舆图册籍”准备投降。守卫在南京的23万军队很快放

下武器，清军没有受到阻挡，于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即公元1645、6.8）开进南京城。弘光政权的官僚们冒着滂沱大雨，任衣冠淋漓，跪道边迎降，南明覆灭。

清军南下，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这时的政治形势正如文天祥在《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中所云：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
流屍漂血洋水浑。

满清统治者受到江南人民的坚决抵抗，于江阴、嘉定尤见人民反抗斗争之激烈。顺治二年六月，清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下令薙发。闰六月，又有诏书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语。当时江阴城里群情愤激，有秀才大呼曰：“头可断，发不可薙。”于是，城内外响应的有数万人，共推明江阴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囚知县方亨，又请出旧典史阎应元为将，布置守城，每户出一人登陴，人人有必死之志。清将李成栋率兵十余万，列营数百，围城数重。江阴人民在阎应元等领导下，坚守三个月，打退李成栋几次进攻。最后粮尽援绝，于八月二十一日被清军攻破。陈遇明巷战被杀，阎应元被俘不屈而死。守城八十一日，无一人降清，城中死九万人，清军死城外亦七万余人，可谓激烈。同时，嘉定人民也揭竿而起，进行反薙发斗争。他们推左通政侯峒曾及进士黄淳耀为首领守城，周围乡兵来援者十余万。清将李成栋领兵围城，嘉定百姓百计守城，死守十二日，七月四日，城破，侯峒曾赴池死，黄淳耀自缢死。清军破城后，对城内进行三次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嘉定三屠”，杀戮情形，伤心惨目。

在全国抗清斗争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不少汉族士大夫阶层，面对着国破家亡的境地，也纷纷起兵。如给事中陈子龙（卧子）、吏部主事夏允彝等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吴江；行人卢象观奉宗室之子瑞冒王起兵宜兴；中书葛麟、主事王朝升奉宗室之子通成王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

兵崇明岛；副总兵王佐才起兵崑山；金都御史金声与邱祖德、尹民兴、吴应箕起兵徽州宁国；兵部侍郎杨廷麟起兵赣州；……。他们有的据城自守，抗拒强敌；有的结寨深山，自保家园；有的困守海岛，矢志不屈。他们保存了民族气节，不向清庭投降。如夏允彝松江起义失败后，自投深渊而死，陈子龙则继续抗清，被逮捕后跳河而死。如黄道周在福建维持唐王政权，被捕后押往南京东华门。黄道周坐在地上，说：“这里和孝陵很近，不需要再走了。”抬头一看，一家店铺的市招上有“福建”二字，就慷慨地说：“福建是皇上所在地，就在这里杀头吧！”道周在南京东华门外被杀。又如明左都御史刘宗周，闻清兵至抗，绝食。当清军以书币聘他出任时，刘口授答曰：“大明孤臣某启：国破君亡，为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讥名教，取玷将来？某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钺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原书不启，投还。”自此以后，勺水不入，作《绝命词》，云：“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登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奉高，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矣，庶几全所受。”绝食久，其子哭着问：“尚有未了事否？”答曰：“他无所事，孤忠耿耿。”又命其子曰：“汝停我于山，当于三年后葬。”因“先帝梓宫尚未落土，示致丧三年之义。”临死，“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肃容端坐。有顷，北首臥，示北向对君之义。初七日，命取几上争砚，书‘鲁’字。初八戌刻，气绝，双眸炯炯，虽殓不瞑。”又如明兵部尚书张国维、朱大典、吏部员外钱肃乐、行人张煌言，诸生王翊等拥鲁王在绍兴即监国位，以抗拒清兵的南下。黄宗羲兄弟、吕留良等学者也纷纷参加抗清斗争，可见明士大夫中抗清情绪之激烈。

在这个风起云涌，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东南繁华之地，到处是颓垣废墟，一片荒凉景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个破坏，